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新世纪文学论稿

——作家与作品



孟繁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新世纪文学论稿

——作家与作品

孟繁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与作品/孟繁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8
(历史与现场丛书)
ISBN 978-7-5203-0216-6

I. ①新…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51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2
字 数 381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 | 1 |
| “守正纳新”的方法论价值和文化意义 ——评《刘中树文学论集》 | 14 |
|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述 ——评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 23 |
| 文本细读与文学的经典化：从理论到实践 ——以陈晓明的《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 批评方法》为中心 | 31 |
| 并未终结的“八十年代” ——程光炜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种潮流 | 51 |
|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的文化问题 ——评戴锦华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 | 58 |
| 文学批评的自觉、有效与节制 ——评陈福民《批评与阅读的力量》 | 66 |
| 当代中国的学院批评 ——以青年批评家张清华为例 | 70 |
| 为了批评的正义和尊严 ——评谢友顺的文学批评 | 78 |



| | |
|--------------------------------------|-----|
| 新世纪的新青年 | |
| ——李云雷和他的文学批评 | 91 |
| 童年经验与文化记忆 | |
| ——张伟教授《姥姥的遗产》序 | 100 |
| 小说的另一种解法和读法 | |
| ——秦万里《小说法》序 | 104 |
| 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 | |
| ——评王充闾的散文创作 | 108 |
| 文人的情怀、趣味与文化信念 | |
| ——贾平凹散文集《大翻扶风》序 | 122 |
| 生命之流的从容叙事 | |
| ——王小波的小说观念与文学想象 | 129 |
| 大舞台主角的隐秘人生与复杂人性 | |
| ——评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 | 138 |
| “说话”是生活的政治 | |
| ——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 145 |
| 这是“未名的爱和忧伤” | |
| ——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 | 151 |
| 《玉米》论 | 157 |
| 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 | |
| ——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 | 167 |
| 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 | |
| ——评邓一光作品集《深圳在北纬 22°27'—22°52'》 | 181 |
|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道路 | |
| ——评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麦河》 | 194 |
| 乡村文明崩溃的前史后传 | |
| ——评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 | 198 |



| | |
|----------------------------|-----|
| 本土叙事与全球化景观 | |
| ——评吴玄的小说 | 205 |
| 中国式的“反乌托邦”小说 | |
| ——评老奎的中篇小说《赤驴》 | 214 |
| 人间万象与绝处逢生 | |
| ——评余一鸣的小说创作 | 221 |
| 面对“现代”，他选择了什么 | |
| ——评龙仁青的短篇小说 | 231 |
| “贱民”的悲喜剧与小说之光 | |
| ——评陈昌平的小说创作 | 237 |
| 文学仿真术与作家的心情 | |
| ——评林白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 | 248 |
| 男女、生死和情义 | |
| ——2004年葛水平的中篇小说 | 252 |
| 都市深处的魔咒与魅力 | |
| ——评须一瓜的小说创作 | 260 |
| 世风世相、女性与家国 | |
| ——评邵丽的小说创作 | 269 |
| 小叙事与大传统 | |
| ——评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 | 282 |
| 发现城市深处的秘密 | |
| ——评晓航的长篇小说《被声音打扰的时光》 | 292 |
| 在新文明的崛起中寻找皈依之路 | |
| ——评吴君的小说创作 | 302 |
| 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 | |
| ——新世纪文学中的魏微 | 310 |
| 历史、主体性与局限的魅力 | |
| ——评鲁敏的小说创作 | 318 |



| | |
|---------------------------------------|-----|
| 信河街上的“反谱系”写作 ——评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小说 | 329 |
| 幻灭处的惨伤与悲悯 ——评蔡东的小说 | 336 |
| 精神“黑洞”和它的讲述者 ——评娜或的小说 | 347 |
| 东君：在不确定性中的发现与批判 | 356 |
| 宁肯：在藏地还会发现什么 | 363 |
| 小叙事中的人性与社会 ——几部作品中的现实与心灵生活 | 367 |
| 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无意识 ——官场小说和它的不同面向 | 377 |
| 山峰正在隆起 ——新世纪初期辽宁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 391 |
| 外部生活与内心世界 ——长篇小说的不同领域与言说方式 | 418 |
| 这一代人的爱与狂 ——“80后”的几位小说家 | 438 |
| 地域风情与人文关怀 ——“关东三马”《风入四蹄轻》序 | 454 |
| 古今对话与戏剧冲突 ——评庞贝话剧剧本《庄先生》 | 462 |

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

沙叶新先生《幸遇先生蔡》的发表，在这个时代似乎成为一个隐喻，“五四”精神、蔡元培精神，在今天与知识分子还有多少关系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五四”的先贤们只能存留在舞台的想象中。事实的确如此，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这个判断与我们正在亲历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这是一个与“五四”大异其趣的时代，无论是精神空间、胸怀气象，还是话题对象、价值观念。“五四”精神在今天正在消失。

今天的思想文化环境，与“五四”渐远，却与晚明相近。晚明处在大变动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贽等，但普遍的却是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盛行。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下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制约下几乎无所作为。因此，“五四”时代形成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蜕化为人文知识专家。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是这个阶层首要的功能和义务。但是，考察本学科知识分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考的问题和发表的言论，更多的是寻章摘句、重复原典的所谓“学术”，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话题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著述凤毛麟角。这时，我想起了谢冕先生。他是我的老师，我可以经常见到他，但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竟感觉遥远无比。这个距离是我们与他的文学信



念的距离，是与他强大而自信的内心的距离，当然也是与他对文化传统、文化变迁判断的距离。我们对当代人的肯定往往吝啬：一是感觉我们自己更重要；二是因对别人所知未深而自然流露的肤浅轻慢。这是这个时代学界的病症之一。

就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五四”时期和 80 年代是最有成就的时候，已是不争的共识。然而，对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种种议论大概也最多。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些议论和挑剔：一是它们值得议论，对它们的反复提及人们怀有兴趣；二是人们总愿意以理想的方式设定未来，寄希望于它更完美的形态。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情感愿望，历史的发展和逻辑的发展难以诉诸设定的形式。当我们以理性的方式面对这两段历史时，我们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敬意和怀恋之情。这是两段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历史，它深置于我们的记忆而使我们只能超越而难以走出，它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和精神遗产，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向我们发出呼唤，而我们则愿意追随。这一古旧的情怀不合时尚，于我们来说则不可换取，其原因也许在于，在五四运动 90 周年到来的时候，那一切只能追忆而难以重临。

谢冕与这两个不同时期密切相关。“五四”的精神传统给他以思想和情怀的哺育，这一传统就是科学与民主，它逐渐衍化为谢冕的精神信念。在这一信念的引领下，他不仅成为“五四”精神的传人，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影响广泛、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家和文学教育家，而且使他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切，在他 8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教学活动中，以最具说服力的形式得以表达。因此，“五四”精神是谢冕主要的思想来源，这一来源支配着谢冕的情感方式，使他不能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内心平静的学者，他不能生存于超然的空间而独善其身，现实的一切与他有关，他只能选择介入的方式和入世的情怀，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展开他宿命般的人



生，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过程中显示他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风采。但这并不意味着谢冕的批评方式和目标追求是超验设定的，恰恰相反，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深置于他的思想深处。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他求证和发现的文学思想和概念，因其科学意义和纯正的学院品格而广为流行。上述三个方面，应该说是我们研究谢冕并走进他的精神空间不可忽略的视角。

谢冕迄今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大，这所中外闻名的学府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精神堡垒，近一个世纪来，“五四”精神和传统几近成了这所学府的象征而被世人瞩目。谢冕求学并工作在这里，他深被“五四”精神所感染，并奠定了他以后许多年的精神信念。这一点不仅在他自传性的长篇散文《流向远方的水》^①中有明确的陈白，而且始终如一地贯穿于他的批评实践中。“他经常神往于五四时代，神往于那个勇敢、活跃、不妥协地除旧布新的时代，那个‘一切都将要发生，一切都正在发生’的时代。”^②黄子平的这一认知相当准确。我们在谢冕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常常读到他对那一时代充满激情和神往的文字：“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时代品质是重新开始幻想和争取。它以决绝的态度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和旧文学，目的就在于它有一种肯定和憧憬的对象。”^③这一对象就是关于“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的一套新的思想”^④。谢冕将这一套新的思想作为精神信念信守，与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80年代初期的中国，刚刚走出20世纪最黑暗的“文革”10年，然而，这10年作为80年代最为切近的历史背景，它的历史形态仍然以惯性的方式几乎无处不在地弥漫四方，

① 谢冕：《流向远方的水》，《作家》1988年第10期。

② 黄子平：《通往“不成熟”的道路——〈谢冕文学评论选〉序》，谢冕《谢冕文学评论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④ 同上书，第3页。



那不仅是一个“启蒙”话语的时代，同时也是专制话语余威未尽的时代。于是，一方面是对“历史必然要求”的解放的企盼；另一方面，则是对这一要求的深切惊恐。20世纪初期的历史情境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几乎又以相似的形态重演。这一切，首先最敏感地反映在文学艺术上。李泽厚后来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或气氛做过如下描述：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60年惨痛之后的复归。历史尽管绕圆圈，但也不完全重复。几代人应该没有白活，几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它比五四要深刻、沉重、绚丽、丰满。^①

这样一个与“五四”酷似的时期，加之这代人特有的情怀、知识背景和对中国属于这代人的认识，他们选择“五四”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就是一种必然。因此，谢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乃至其今天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展开的。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曾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所传达的思想观念在今天看来已远远构不成“异端”，然而在当时却有如石破天惊，它使一些人震怒并且恐惧，作为文坛“公案”，对它的“诉讼”长达数年之久。这篇不足3000字的短文，同样首先谈到了“五四”：“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楷模。”^① 面对又一场诗歌革新运动，他指出：“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他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② 谢冕对上述观点的表达是柔和而平静的，即使在当时看来，也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所谓“激进”。当然，这一从容的表达并不是顾及某种压力或是策略上的考虑。事实上，从那时起他所选择的陈述对象，无论是诗潮还是具体的诗人、诗作，他都将“五四”精神作为一个明确的参照，从而维护、鼓励那些具有革新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诗人去大胆探索。他最先评论、支持的一批青年诗人，先后构成了80年代“新诗潮”的主力阵容，如北岛、舒婷、杨炼、顾城、江河、骆耕野、徐敬亚、王小妮、傅天琳、梁小斌、陈所巨、王家新等。这已成为史实的现象说明谢冕不仅具有民主、宽容、自由的“五四”精神传统，同时也说明他具有超越普通批评家的审美洞察力。上述诗人的作品不只因当时表达了不合世风的思想观念而卓然不群，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诗歌的表达形式、语言、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重大超越。而谢冕正是以他作为杰出批评家独具的敏锐眼光做出了自信而正确的判断。这一情景自然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周作人对李金发的支持，鲁迅对萧军、萧

①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② 同上。



红、殷夫、高长虹等青年作家、诗人的鼓励与提携等，他同样“肩着闸门”。不同的是，虽然“那时的旧势力太强大也太猖獗”^①，但他们毕竟没有像谢冕那样除了文化之外还要承受霸权话语的双重压力。因此，谢冕和他有共同信念的人一起，是以不妥协的坚持战胜了80年代中国文学关键的一役。从那时起，当代中国文学才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时代多变，但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想起那一时期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健康力量的决绝和坚韧，依然给人以一言难尽的万端感慨。

谢冕深被“五四”精神所吸引，这决定了他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处于“进与退”“出与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和选择中；到了现代，是做“问题中人还是学术中人”，是重思想还是重学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依然痛苦地困扰着他们。但就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而言，那些具有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前者。百年来的内忧外患，使这样的知识分子难以安于书斋，中国的历史境遇培育了知识分子中国式的、特有的思想情感方式。他们虽然历经了“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对传统的“人世”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但就其本质而言，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那样：近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不但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彩，而且还焕发了新的光辉。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明道救世”的大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人物主要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重大的思想解放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传统的名教纲常看作天经地义了。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思想信仰的内容方

^① 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①这一性格隐含无可抗拒的文化基因，它不是一种姿态或对革命有着先天的狂热，它首先是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情感需要。谢冕常常表达他这样的看法：“我们有幸站在两个重大时代的交点之上。历史给我们以机会和可能进行范围广泛的全民的反思。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民族的灵智。作为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当然无法（当然也不谋求）逃遁这一历史的使命。”“中国诗歌传统的强大和丰富，曾经痛苦地折磨着，并考验了我们的前辈——五四新诗革命的前驱者们。如今，轮到他们承担他们所经历的一切。”^②这多少有些悲怆的意味仿佛成了一种无可回避的、被选择的宿命。这种介入或“入世”的精神使谢冕与现实的关系充斥着一种紧张感。他的研究或批评对象基本是在诗歌领域，但他的每本著作或每篇文章，几乎都密切地联系着百年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联系着每一时期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正因为如此，谢冕的影响才远远超出了诗的领域，才会在文学界、文化思想界乃至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的命运始终是谢冕从事文学研究的宏阔背景，他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研究而研究的所谓“学术中人”，他的文学功用观前后虽然有过不小的变化，但他始终没有动摇的则是文学力求“有用”的看法。作为他那一代人，他也难免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他曾经认为：“把诗歌当成一种‘甜蜜的事业’，实在是一种误会。常常被人们喻诗歌为炸弹和旗帜，是就其主要的战斗性能而言的。这种性能当然不是唯一的，当然会有也应当允许有让人娱乐、让人休息、让人轻松的诗。但这些，从来也不构成诗歌的主流。

^①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辛华《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② 谢冕：《谢冕文学评论选·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要是把讨人喜欢当作诗歌刻意追求的目的，要是立志只做甜蜜的诗人而回避诗人的愤怒，我们只能为诗歌的失责而遗憾。”^①这一看法就其针对长久流行的“颂歌”传统而言是切中要害的，鼓励诗人的社会批判职能同样能够理解，但他后来对文学功用观的表达则更为平实并切近文学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②谢冕对文学功用观认识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它启示我们对文学的可能性及有限性持有清醒的认知，而免于陷入对文学功用的自我夸大或沉迷于自造的神话。他对诸如“文学救国”的幻觉持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作用于社会持虚无态度，他同时被感动的还有“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赴后继的情景”。

谢冕的介入意识、忧患情怀和文化批判取向，虽然密切地联系着70多年前的那场伟大的创世纪的运动，他向往、憧憬但并不膜拜，他倒是经常提醒自己和世人对“五四”的激进和偏执要有所警觉：“70年前的缺憾是创造的激情把旧物当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现出对待传统的无分析性和片面性。”^③“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意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④这一立场出于不偏不倚的策略性考虑，事实上他对于传统有分析的对待时常有不经意的流

① 谢冕：《诗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② 谢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页。



露，但他的“传统”不是那个一成不变的古老神话，不是随意可以装进叙事“口袋”的材料。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传统中，我们也创造着传统。传统之于我们，并不意味着一潭死水，更并不意味着是失去意义的河床。传统是长河，源流绵远，从远古流淌至今。它处于不断凝聚而又不断更新的状态。它并非凝固不变，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历代先民的智慧创造，积淀而为丰富的文化诗歌传统，尽管它的构成之中有相当稳定的基因，但又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着的”^①。谢冕的这一“传统观”不仅使他拥有了面对“权威”从容自若的心态——既生活于传统之中又以自己的方式丰富、创造着传统，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对于自己也是传统过程的历史感。他常常坦然地诉说自己那类似“中间物”般的真诚心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是受到青年热爱和尊敬的著名批评家，但他仍不断地检视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理解我的师辈，也可以理解我的同辈，我理解他们痛苦的追求、追求的痛苦。但对于我的晚一辈，我的学生就不能够很充分地理解。”^②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他同样认为：“单一的评论面临多样的创作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我感到了一种力不从心的困窘。我所熟悉的那套评论模式，有的已不够用，有的是不适用了，需要用新的姿态、新的面貌去学习许多新的课题，迎接这场有意义的挑战。”谢冕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风采也许正是因为不仅体现于他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而且也体现于他敢于正视自己、检视自己，以同样真诚的心态进行自我批判并坦然处之的健康心态中，才为我们格外尊重。这种自我更新的内在紧张，是谢冕保有批评活力、长期处于批评领域前沿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秘密。

^① 谢冕：《谢冕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② 谢冕：《中国新时期诗歌变革的潮流》，《地火依然运行·代序》，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多年来，我曾就学于谢冕，对他的情趣和爱好是有可能了解的。在我看来，无论是生活还是审美，他都有一种明显的“唯美”倾向——他喜欢诗，喜欢美文，喜欢哪怕是文学批评的文字也能给人带来“愉悦”。这一切，只要读他诗意般的批评文字便会明确感知，这自然也确立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风格。同时，让我们同样感受深刻的还有他作为学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如果说“问题中人”与“学术中人”“重思想”与“重学术”这种知识分子类型划分成立的话，那么，谢冕属于前者。如前所述，他的情怀、使命意识和他身处的历史境况，都使他只能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只能选择索性在荆丛中行走的悲怆，他选择了启蒙话语和特殊时期作为相对真理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武器。但是，就谢冕的文学批评活动而言，又使我们认识到，上述“类型”的划分又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它们只有相互渗透、互为前提才能成立。就人文学科而言，“问题”与“思想”如果失去科学依据和学术品格，也只能流于肤浅或虚假；而“学术”如果不具思想或发现“问题”，也会成为雕虫小技或流于烦琐考据。因此，二者的关系不可能也没必要截然对立。20世纪80年代以降，谢冕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已成为事实，而他前瞻性的锋芒思想和他的科学精神同样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那是一个必须潜心认真对待的时代，一切似乎都须从头说起，关于传统，关于革新与保守，关于开放与关闭，关于成熟与陌生及许多与艺术相关或并无直接关联的话题，都须持之有据，立论坚实——他们那代人的沉重和坚韧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考虑，谢冕都不能允许自己失之于严谨和慎重，而这些又必须通过科学的表述才能得以实现。他那些宏观性的命题常常让人感到高屋建瓴、气势宏阔，但却不能离开他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熟知。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曾有过如下陈述：对新出现的诗歌现象，“在反思的基础上，我看到了新的崛起；继而，